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嬗变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修订版

刘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嬗变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修订版

刘 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修订版）/刘纳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357-9

I．嬗…

II．刘…

III．近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0263 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嬗 变

——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修订版）

刘 纳 著

Shanbi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4.2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76 00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嬗
变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变动中的文学变革	(1)
一、文学界标与历史界标的重合和错位	(1)
二、文学神话：追寻“根本”的思路	(12)
三、面对世界：翻译与仿效	(21)
四、规律和选择：文学的历史性与非历史性	(33)
第二章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	(46)
一、在“小说界革命”的旗帜下	(46)
二、时代歌手和光宣诗人	(52)
三、戏曲与弹词	(59)
四、男性导引下的女性写作	(67)
第三章 1912—1919 年的中国文学	(89)
一、凭吊：时代气氛与文学氛围	(89)
二、骂世、警世、混世、避世与售世	(115)
三、一个奇景：骈文的兴盛	(153)
四、中国古典文学的回光返照	(165)
五、终结与开端：回首新旧、文白之争	(184)
第四章 在比较中寻找变革的轨迹	(199)
一、从皈依政治到注重思想	(199)
二、“国民”与“人”	(213)
三、中年哀乐与青春感悟	(224)
四、酩酊与梦幻	(249)
五、望夜空	(270)
六、五四新文学创作者对于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	(293)

第五章 五四新文学的实绩与光影	(313)
一、文体新格局中的散文以及小说与诗	(313)
二、探寻“巨人”	(323)
三、贫瘠的实绩与神奇的光影	(332)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作家	(343)
主要参考书目	(350)
附录 关于《嬗变》：说明与反省	(354)



嬗

变

第一章 历史变动中的文学变革^①

一、文学界标与历史界标的重合和错位

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的变革，开始于1902—1903年间，完成于五四之后。它跨越三个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时期以及在这之间的一个没有名目的时期：1912—1919年，经历近20年，由两代文学作者完成。

“近代”，不但是个表明时代范畴的概念，而且是能够说明文学性质的概念。

从古代文学到近代文学的变革，首先发生在西方各国。它发生在“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意大利，出现了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和人文主义先驱彼特拉克、薄伽丘。接着，发生在法国、在西班牙、在英国、在德国、在俄国……内容方面，表现为反封建、反专制、反神权，要求民主和人性解放。形式方面，表现为形成新的文学体裁、表现手法和使用比较接近口语的、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这个变革的过程与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历史相一致，它反映出人类精神生活发展的共同趋势。

同样性质的文学变革也终于在中国发生，尽管中国文学的变革独具特色。

寻找这个变革的轨迹，便为文学历史的分期找到了依据。

1840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促使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形态转变。列强一

^① 为保持本书初版时原貌，尊重作者意见，此次修订对注释项只是略作调整，未强行统一。——编者注



次次入侵，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时期社会的变化是剧烈的。1840年前后的文学也出现了变化。在开拓型文学人物龚自珍的诗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渴望变革、急欲突破传统的强烈要求。冯桂芬、王韬的作品开我国近代新体政论散文之先河。魏源、林则徐、张际亮、张维屏等人的诗文也都显示了一些变化。这些渐进性的变化表现出古代文学向“近代”发展的一种意向。

其实，“近代”文学的因素在1840年之前也已经开始萌生。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那是中国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的年代，《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显示了尚朦胧、尚迷惘的近代意识的端倪。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明朝嘉庆至万历年间，当古老帝国内部终于艰难地滋生出新的经济方式的萌芽，在文化领域，有我国古代最具叛逆性的“异端”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出现，有反复古、反道学的公安派、竟陵派的出现，有洋溢着反抗精神的《四声猿》和透露出个性解放气息的《牡丹亭》的出现……文学变革的新因素早就在逐渐地积蓄着、准备着。

而在19世纪末，中国维新人士中出现过一股否定文学的思潮。

前人对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历程做过种种描述。如钱智修说，七八十年代有“富国强兵之说”，八九十年代有“格致实学之说”，1898年以来，“有民权自由之说，有立宪共和之说”^①；林语堂在1925年说过：“二十年前始承认政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的必要。”（《致钱玄同》）他们的描述并不相同，也并不完全准确，但却一致认为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国输入欧洲自然科学，“格致实学之说”大兴的年代。

当时，我国的先进人士以为西方列强国富兵强的奥秘，在于重视声光电化之类的“实学”，而这种“实学”又是与文学对立的，不能并存的。王韬漫游欧洲，以见闻实感说英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他们重视天文、地理和声光电化一类的“实说”，而“弗尚诗赋词章”^②。留学过英国的严复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它们“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中国之所以贫弱是因为“其学最尚词章”，词章虽然极尽海市蜃楼、恍惚迷离之能事，却无济于救国。所以，散文不管是唐宋八大家，还是桐城派；诗，不管是唐诗派，还是宋诗派，通通是无用之物。因此，要想

① 钱智修：《功利主义与学术》，载《东方杂志》第15卷第6号，1918年6月。

② 王韬：《漫游随录》。



弃贫弱而谋富强，就必须弃诗词之类的文字而发展声光电化之类的“实学”。^①

19世纪90年代维新运动已经兴起，开通民智的主张也已出现，但是，维新人士不但没有想到利用文学，反而把文学当成了经世致用的累赘。谁能想到，出身于书香官宦之家，又擅长诗词文章的谭嗣同，竟然说“文无所用”（《三十自纪》），诗歌是“无用之呻吟”（《莽苍苍斋诗补遗》），看戏竟会与赌博一样徒害而无益。谁又能想到，文坛骄子梁启超竟然会说，谁要想以诗词鸣于世，谁就是“浮浪之子”^②。谁要是耽于吟咏、笃好词章，谁就是“玩物丧志”。词章为害之大，“竟与声色之累无异”（《林旭传》）。谁又能想到当年的维新知识界中竟然以诗词为戒，相率而戒诗？

对于这种风靡一时的社会思潮，梁启超曾经从人们对于西学的认识的角度作过描述：“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以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书中求之，亦确无其他学问可见。”^③王韬则主要从新学发展状况的角度说明当时的人们凡谈论富国强兵，无不以发展实业为上策，“一若裕民而足国，非此不可。至于学问一端，亦以西人为尚。化学、光学、重学、医学、植物之学，皆有专门名家，辨析毫芒，几若非此不足以言学，而凡一切文学词章无不悉废”^④。查一查当年的学会名目和西学书目，可以验证他们的描述是可信的。

在传统的文化结构中，虽然小说戏曲受到轻视，但诗词文赋还是够资格与经、史、子并列，成为“四部”之一的。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既有人把诗视作足以感天地、泣鬼神的神物，也曾有人看成雕虫小技，但绝没有人将其当作“与声色之累无异”的“丧志玩物”。

上述否定文学的思潮以其尖刻和偏激显示了当年知识界对于传统文学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感既然来自先进人士对于旧文学的激愤，岂不也包含着他们对于未来文学的厚望吗？人们既然依据对于西学的认识否定了以往文学的社会价值，岂不会根据对于西学的再认识，重新肯定文学的社会价值吗？日后文学变革运动的兴起表明，这是一个新的历程的开端，人们将要重新确定文学的外部关系与内

① 严复：《原强》、《救亡决论》。

② 《变法通议·论女学》。

③ 《清代学术概论》。

④ 《上当路论时务书》。



部关系，重新探索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

戊戌变法失败后，1899年12月，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里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和“文界革命”的预测。这是我国近代文学变革的重要文献，它准确地表述了文学变革的两种思想倾向：批判传统文学和借鉴欧美文学。它指出我国千余年以来的诗人如同“鹦鹉名士”，陈陈相因，诗歌境界已经被开拓殆尽，已经到了“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的危急关头；必须输入欧洲的“真思想”、“真精神”、“真意境”，必须出现哥伦布式的人物开辟诗歌新大陆，必须有高唱《马赛曲》的勇士破旧以求新。它认为当时“诗界革命”已经显示出即将到来的征兆，却还尚未到来，诗歌界的哥伦布将要出世而尚未出世，不像后来的《饮冰室诗话》那样轻易称许诗人。它虽然规定了“旧形式、新内容”的“革命”方案，但又意识到新内容、新语句和旧形式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不像《饮冰室诗话》那样以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结合作为诗歌“革命”的极致。在此之前，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写道：“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表现了对小说政治作用的期望。

“新”的、“近代”性质的因素终于发展成为我国文学的主潮，从而改变了我国文学的性质，是在1902—1903年间。

梁启超说：“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①我国文学的“新陈嬗代”也酝酿于此时。到1902—1903年间，终于在文学观念、文学的精神意向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变的趋向。

出现于1902—1903年间的大量文学现象表明：正是从这时起，我国文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发表《饮冰室诗话》，开辟《诗界潮音集》专栏。《新民丛报》第3号发表了蒋智由的著名诗篇《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诗的最后两句次年被邹容在《革命军》中引用，成为嘹亮的时代号角。

^① 《本馆第100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清议报》，第100期。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大大发展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抬高小说作用的论述，不但奠定了“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变革有重要影响。

也是在1902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这是我国第一种近代性质的文学杂志。在这一年，它发表了雨尘子的《洪水祸》、梁启超本人的《新中国未来记》、署名“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等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新的社会理想和精神意向。同时，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这一年刊登6篇小说，其中5篇取材于西方国家人物故事。

也是在1902年，李伯元发表《庚子国变弹词》，它“是代表了旧的弹词最高的发展，是突破了英雄美人、佳人才子一般固定的老套，走向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上的特殊事变。根据这已有的最高的发展，是更易于探寻再进一步的新路的”^①。

也是在1902年，于右任写下了洋溢着新的时代精神的诗歌。如《杂感》：“……地球战场耳，物竞微乎微。嗟嗟老祖国，孤军入重围。谁作祈战死，冲开血路飞。”如《从军乐》：“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吾人自当造前程，……风潮汹涌廿世纪。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拊金齐奋起。”如《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人权公对文明敌，……革命才能不自囚！”

1903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文明小史》等谴责小说开始在《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杂志上连载。这些作品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揭露。作者们呼吁改革弊俗，刷新政治，富强国家，开通民智。谴责小说的鲜明的“暴露”的倾向，显示着我国小说主题走向的改变。

也是在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问世。它“破嗓裂喉”，“劝动天下造反”。它实现了宣传性与文学性的融合，建立起新的宣传性散文的典范。

也是在1903年，秋瑾写下著名的《剑歌》、《宝剑歌》。在这一年，16岁的柳亚子开始发表诗作。在这一年，高旭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欲为我国民牺牲者其歌者》、《海上大风潮起放歌》、《军国民歌》等。在这一年，《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国民日报》

^① 阿英：《重刊〈庚子国变弹词〉叙》，见《小说二谈》，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等进步刊物刊行，它们发表的大量诗文、小说、戏曲，显示了新的文学姿态。

应该承认，直至五四以前，我国文学的传统格局仍然维持着，但是，自1902、1903年之后，在表层之下，已经汹涌着新的文学洪流。作者们虽然容忍了传统的封闭的总体模式，却给已趋僵化的艺术定型注入了新的生气。他们大大抬高了小说、戏曲的地位，他们把民间通俗形式弹词、戏文、歌谣等引入了文学的厅堂。这些，为五四时期我国传统文学格局的大突破开拓了道路。

开始于1902—1903年间的文学变动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一致。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1903年已受到学者们的重视。李泽厚曾认为1903年的拒俄义勇军运动是一个“历史界标”，这一年“成为革命发展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他指出：“全国各报刊由温和而激烈，由改良而革命，是在这一年。邹容、章太炎的著名革命文章和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是在这一年。陈天华那影响极大的小册子的产生，是在这一年。鲁迅译作《斯巴达之魂》，提倡‘尚武精神’和爱国主义，是在这一年。”^①章开沅也认为“癸卯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起来的一年”，他指出：“经过‘拒法’、‘拒俄’和《苏报》案三次斗争，人们迅速增强了政治觉醒，……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精神堤防日益溃决，民权革命的思想仿佛清新的春风一样吹拂着祖国的大地。”^②

在这里，文学变革的界标与历史的界标相重合了。在20世纪的前20多年，甚至在整个20世纪，它们大致是重合的，于是历史分期成为了文学分期的依据。以历史分期为依据并非无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而是出于对这样的文学历史发展事实的尊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变革，始终与政治历史、社会思潮的变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历程相一致。

我也曾经希望回到文学自身，去寻找我国文学从“古代”到“近代”性质的变革的“内部”规律，得到的却是困惑。从内容方面

①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295页，人民出版社，1979。

② 《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跋乌目山僧癸卯诗三首—1903年的国内革命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



看,我国文学自明朝中叶就逐渐蕴积着个性解放的因素,然而,开始于1902—1903年间的文学变动却与此种精神意向脱节。被政治需要挤压着,个性解放的因素没有继续发展,大量表现在激进文学中的,是另一侧面的近代意识——群体意识。从形式方面看,王国维说:“盖文体通行既久,指染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中衰者,皆由于此。”^①在产生了《长生殿》和《桃花扇》、《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样优秀的伟大的作品之后,古典戏曲、古典小说明显地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古典诗词、古典散文衰落的趋势出现得更早。我国古典文学的各种形式,早就盛极而下,需要寻求“解脱”之路。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文学实践证明:尽管不乏“豪杰之士”,单靠文学自身的力量,无力促成各种文体的“解脱”,更无从实现真正的变革。

与古今中外一切精神领域的变革一样,我国文学变革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②。陈独秀说过:“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③然而,这种概括只是在间隔很远、隐藏很深的“根本”的意义上才是无懈可击的。人们可以列举数字,说明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所发展,在五四之前,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例如,“拿全国各地逐年创设的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来说,中日甲午战争后6年间(1895—1900年)共有104家,资本总额2300多万元,每年平均投资380万元多一点。这以后,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一年的1910年10年间,共有370家,资本总额8620万元,每年平均862万元。”^④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资的面粉厂由20多家增至100多家,纺织厂由10多家增至50多家,纺锭数由40多万增至150多万……这些是事实,不过,又是多么不足道的事实。华资工商业的有所发展,远远不足以改变民族资本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微弱比重。以经济原因、阶级原因来直接解释我国文学变革,只能得出牵强的结论。

是的,“应当记住,决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因此,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的环级”^⑤。在探讨我国文学的

① 《人间词话》第54则。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205页，人民出版社，1963。

③ 《〈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适之》。

④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843～8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⑤ 普列汉诺夫：《论〈经济因素〉》。



变革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到”的“中间的一环”便是激进知识分子寻找救国道路的艰难历程，以及他们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

1917年，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难宣言《文学革命论》里，将“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于没有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配合。70多年来，这一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概括不但被人们接受着，而且，被发展了。学术界形成了相当普遍的看法：缺少一个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启蒙运动，才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因而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补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同时，曾经对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发动猛烈的攻击，曾经广泛地传播近代民主思想，曾经发动过具有相当声势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个思想启蒙运动不但有“政治思想”的启蒙，也包括着提倡“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女权革命”等内容。不但梁启超在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期间，热情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文化学说，“倡民权”、“倡自由”，以不可抵挡的煽动力量呼唤“大变革”、“大破坏”，不但革命宣传家邹容、秋瑾等慷慨悲歌，为民主、为社会进步奔走呼号，而且，在《湖北学生界》、《直说》、《广益丛报》、《国民日报》、《觉民》、《安徽俗话报》等刊物上，都激荡着反孔、反封建、反专制，铸造新国魂的呼声。当时激进知识分子集中的中国留日学界，“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①。即使排山倒海一般的“排满”宣传，也不能遮掩这个思想启蒙运动的民主主义光辉。而且，对“排满”也要做具体分析。在当时，“推倒满清政府”本身，就包括两重意义：“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② 陈天华在《绝命书》中也写道：“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进展，例如有的学者在列举了20世纪初几年间革命派报刊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的大量材料之后，写道：“把这些文字同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新青年》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是何等相似！我们甚至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卷，46页，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

②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基本特征，……早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最初阶段就已粗见端倪了。”^① 历史学家蔡尚思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是以进行民主革命为中心，在思想上是以反孔教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就这个反孔反封建传统思想而论，是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而为五四运动时期的前驱的。”^② 开始于1902—1903年间的文学变动，正是与此同时开始的声势壮阔的思想启蒙运动之一翼。

中国近代性质的文学变革发生在先进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地寻找民族出路的历史行程中。它因“救国”的需要而发生，为表现时代主题而存在。从这里入手，我们能梳理出、把握住20世纪前20多年间文学行进的主流趋向。

辛亥革命时期与五四时期，这是两个历史的时期，也成为了两个文学的时期。作为历史时期，它们分别以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与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反帝运动为中心。在本书中，辛亥革命时期的时间界限是自1902—1903年间至1912年初，历史界标与文学界标基本重合。而对于作为文学时期的五四，则需要作如下说明：

1917年初，当胡适、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张扬起“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的旗帜时，他们绝不会料到，他们所发起的文学运动，将被冠以五四的名称。那时，距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还有两年多。

然而，产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学现象，连同那整个时代，已经历史地与五四这日子胶合在一起。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感到其间的联系中包含着多少偶然和误会，也已再无法为1917年初开始发难的“新”文学正名。不过，不能不提到的是作为文学时期的五四与作为历史时期的“五四”在时间上的错位。对于五四时期的时间界限，以往有过多种看法。茅盾认为：“‘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算起，到后二

^① 胡绳武、金冲及：《辛亥革命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见《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② 《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见《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①按照他的界说，从1916、1917至1921、1922，五四走完了它的历史过程。确实，“这样去理解‘五四’，方能够把握‘五四’的真正的历史意义”，也才能更准确地探寻两个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把作为文学时期的五四的下限划到1922年，那么，我们面对的只是一个相当空荡的尚未“热闹”起来的新文坛。也是矛盾，曾经回顾1922年之前新文学创作界的“寂寞”：“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关也寥寥可数。”只是从1922年起，“那情形可就不同了”，“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②他的回顾符合文学历史的实际。也就是说，尽管新文学早在1917年已经发难，但新文学创作出现活跃而热闹的局面，却是在五四的历史风潮落下帷幕以后。因而，当我们讨论五四新文学创作的实绩时，不能不将考察范围延至1924年前后。

在对20世纪初20多年间文学历史的研究中，人们常常能看到“过渡”一词。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曾被研究者犹犹豫豫地称为“一个过渡”。

是的，它是“一个过渡”，它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开拓了道路。同时，它又不只是“一个过渡”，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学时期。它为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文学的记录。虽然旧的文学格局仍旧维持着，但在表层之下，已经汹涌着新的文学洪流。那一代文学作者给已趋僵化的艺术定型注入了生气，他们的探索为我国文学提供了新经验，尽管“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通向世界文学的大门却已经打开了。

辛亥革命时期涌现出一批出色的文学人物，尽管囿于狭窄的文学观念和狭窄的审美选择，尽管时代没给他们提供尽展长才的时间和空间，他们仍然建立了不容忽视的文学业绩。有人把辛亥革命时期的我国文学比作夜空：繁星丽天，却没有月亮。我们也可以把它比作海洋：一个虽不够深邃却广阔无垠的文学海洋。那时期的出色的文学人物，一个个才能卓荦，然而，这才能，带有相当的片面性。他们都是复杂的人物，然而，这复杂，处于比较浅的层次上。他们的文化素养与艺术资质并不低于五四那一代作家，却集体地演出了

① 《“五四”运动的检讨》，载《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署名“丙申”。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